

董
冰
著

老
家
旧
事

李準夫人自述

- ◆ 家里八个月病死四口人
- ◆ 过年过节的种种风俗
- ◆ 鬼子来了
- ◆ 李準的童年
- ◆ 嫁到李準家，繁重的家务活
- ◆ “三反”运动中李準被诬贪污
- ◆ “文革”中李準的悲惨遭遇

學林出版社

老家旧事

李準夫人自述

董冰著



学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老家旧事/董冰著. —上海:学林出版社,2005. 8

ISBN 7-80730-013-2

I. 老… II. 董… III. 董冰—自传 IV. K828.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93308 号

老家旧事

——李准夫人自述



作 者——董 冰

责任编辑——周清霖

封面设计——李克坚

出 版——学林出版社(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3 楼)

电话: 64515005 传真: 64515005

发 行——学林书店上海发行所

学林图书发行部(钦州南路 81 号 1 楼)

电话: 64515012 传真: 64844088

照 排——南京前锦排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上海市美术印刷厂

开 本——889×1194 1/32

印 张——8

字 数——20 万

版 次——2005 年 9 月第 1 版

2006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

印 数——3001-5300 册

书 号——ISBN 7-80730-013-2/I·4

定 价——18.00 元



作者简介

董冰，原名董双，一九二八年三月出生于河南省洛阳市孟津县南麻屯镇董家村，一九四五年与李准结婚。一九八三年到一九八五年写作本书。

- 一个贫苦农民的女儿
- 一个地主大家庭的儿媳
- 一个著名作家的妻子
- 一个六个孩子的母亲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著名作家李準的夫人董冰所著的回忆录。董冰是一个出身于河南洛阳邙山岭上的农家女，自幼家境贫困，后由父母做主，许配给了邻村一个大家族的长孙，他就是后来成为中国著名作家的李準。

从一个贫家女到一个地主家的孙媳妇，再到一个著名作家的夫人和一个六个孩子的母亲，董冰的一生可说是最平凡的一生，也可说是并不寻常的一生。

在贫困的豫西山区，滞留着浓厚的封建习俗，地主家庭的男人出门要穿长衫，娶来的媳妇则被当作长工一般使唤。董冰是长孙媳妇，进门没几天，二十多口人的做饭挑水、纺花织布等家务都落在了她十八岁的肩头上，农忙的时候还要下地干活。在董冰的笔下，你能体验到旧时代女性所承担的压力。

五十年代，李準逐步进入文坛，成为名家。“文革”中又一落千丈，被打成“黑帮”，多次被抄家和批斗，六个孩子全部下放到农村，这对一个妻子和母亲来说，都是巨大的折磨。

从邙山窑洞里走出来的董冰，晚年定居在北京，她用最平实最朴素的语言，真实地记载下她所经历的生活。最真实的一定是最生动的，她将把你带到中国过去的农村——一个最真切的世界里。

序

舒乙

老
家
未
人
自
述

写这篇序完全是一个特殊的经历。

这本书是一个特殊的人写的一部特殊的书，写得又特别好看，会给念书的人以特别的启示。

写书的人是一位老夫人，叫董冰，是李准先生的老伴，典型的家庭妇女，农民出身，没上过学，结婚之后才跟李准学认字和写字，生了六个孩子，解放后上过一些日子的识字班，仅此而已，谁也没想到，她居然写了一部书。

李准第一次患脑血栓基本康复之后，就任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由于工作关系，我和李准一家人慢慢熟悉起来，也和这位大嫂见过多次，但过话不多，她不爱说话，几乎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只知道她是一位贤妻良母式的主妇，对病后的李准照顾得无微不至。李准本是一位热情之极的人，此时对这位夫人更是赞不绝口，甚至情不自禁地写过文章赞美她，公开发表，题目叫《糟糠之妻不下堂》，读后引得大伙抿着嘴乐，但无一例外都有同感，觉得李准亏得有这位大嫂，身体才恢复得这么好，活得依然有滋有味。

有一天，她的女儿悄悄告诉我，老太太偷偷地在写小说呢，谁也不给看，只顾自己写，写完了就锁起来，没有人知道她写的是什么。李准说，她一肚子故事，记忆力又特别好，写出来就是好东西。不过，她写的东西，也不叫李准知道。

成了一个谜。

这个谜一直保持到李准去世之后，渐渐被人遗忘。

忽然，有一天我家里接到一个电话，说老董找我，吓了我一跳。以前李准发病，每次都是董大嫂给我打电话，叫我快去帮着



抢救，以致我一听是老董的电话就不免有些紧张。赶快回电话，没人接。问她住在别处的子女，答不知道妈妈有什么事。好不容易等到第二天早上，电话里老董说，她写了一本书，准备出版，要我为她写序。我估计就是那个谜。我请她赶快把稿子拿来，她说：“中！中！”

我花了两天把稿子仔细念完，惊叹：竟是一部非常好的书！

穷，可是文化不穷

中国的事很怪，穷归穷，可是有文化，认真写出来，把中国社会最低层的事情如实道出，竟是绝好的文章。

不得不佩服中国这个大国的历史了。唯独有这么丰厚的文化古国才能出现这样的老妇人，别瞧没有上过正规学校，一旦拿起笔来，叭、叭、叭，如实写来，其所经所历竟成千古奇文。看她写的任何一段，都有丰富的内容，非常细致，细枝末节上多角多棱，很出彩，这种东西，凭想象是没办法写出来的。她所写的一些民俗，对不少人来说可能都是闻所未闻的，只要记下来，天然也是富矿，价值极大。不管是写过年，是写结婚，还是写出殡，讲究得很，程序一道一道，数不过来。她所写的书，从另一角度看，完全可以当大百科全书里的民俗解读用，对拍电视拍电影是非常有用的好东西。真的，现如今，到哪儿去找这么有具体细节有地方色彩的现成的描述啊，可谓难能可贵。

穷得惊心动魄

董冰笔下的“穷”没有一点政治上的框框，是“纯”的穷。

这在中国文坛上十分难得。

原因是她不是作家，她没受过训，没学习过哲学和政治经济学，脑子里没有阶级斗争的观念。在她那儿只有生活。她不用把她知道的一切都装在“筐”里，她没有“筐”，她直接把一切都简单地托给你，原汁原味。这个更厉害。

所以，在她那儿，没有扬鞭子的人，没有不遗余力逼债的情节，几乎一切惯用的人为的压迫手段都没有出现过，可是真穷，穷得那么惨，穷得那么触目惊心，穷得那么叫人喘不上气来，穷得那么没有活路，这才触到了穷的最痛点，你不能不仰天长叹，你不能不落泪。那个旧中国太落后了，真是要不得，需要大改良，绝对应该换朝代！

感人的现实和现实的感人，就是这样。

用不着任何形容，用不着任何渲染，她也不会故意形容和渲染，她老实地讲出来就是了，靠那些事情本身说话。你念着念着，不知不觉中已经泪流满面了，有如千斤重担压下来，那种想象不到的毫无退路的穷，便仿佛能将你窒息，使你受了极大的感动。于是，你便再度确信了生活是写作的源泉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的价值。

随便摘出一段，做个例子吧：

“有一次，我和姐姐跟妈商量想去赶个春会，我父亲也很同意带我们去看看热闹。头天说好了，还烙了点饼拿着到会上中午吃。到了中午，父亲给我们端来了一盘水煎包子，外边黄油焦皮真好看。我们是从来没吃过的，因此非常高兴。他把那盘包子递到我们手里，他却一个也不吃。我们说：“爹，你也吃两个，咱们都吃点尝尝。”可是，怎么劝他也不肯吃一个。他自己蹲在那土坡上啃带的干馍。他的意思是，孩子们长这么大没赶过会，今天来赶会不叫我们吃点什么，他心里老过不去。可他钱又不多，只能买这一盘，他直嫌水煎包子少，嫌我们吃不够，所以他自己一个也不吃。我们都知道，父亲没有钱，我们并不要求吃够，就是什么也不买，也没有啥。买来了光叫我们吃，我们实在吃不下去。看着父亲太可怜，我们虽然把一盘包子吃完了，但是却不知道包子是什么滋味，光觉得鼻子发酸。”



应该说,这样的故事满篇皆是。它们充满了真情,朴实无华,不必编,不必造,自自然然流出来,全是好文字。

中国妇女命运的大典型

董冰的书的最大价值在于她在最普通的定位上不动声色地为中国妇女的命运塑造了一个大典型。

过去有许多作品是着重描述中国妇女的苦难的,但其中被叫好的多半是两种,一种是关于婚姻的不幸的,如《家》、《雷雨》;一种则侧重从社会学的角度,即阶级压迫,如《祝福》、《白毛女》。这两类作品都在社会上产生过重大影响,并成为经典,至今仍被人们传阅。但中国农村妇女生活本身的苦却不曾被细致地描绘过,这和中国现代作家的出身、经历和生活环境不无关系。“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知识分子作家们的绝大部分是出身有钱阶层的,自己对穷人的生活只有一些间接的了解,而没有亲身的体验,虽然有后来的所谓“体验生活”,但毕竟无法把握细节,特别是对妇女的生活细节,更是隔着一层。

二十多年前,一部叫《阿信》的日本电视剧感动过无数中国观众。《阿信》的成功就在于她的苦,生活的苦,原汁原味的苦。当时,有不少中国观众曾经感叹过,中国农村妇女的生活可比阿信苦多了,可是,却没有如实地表现过,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学艺术的遗憾。

终于等来了一部,就是董冰的自述。

事情往往是两面的:会者不知;知者不会。结果什么也没有。

好了,终于有一个“知”者动笔了,她如实道来,细细写下,皆成文章,成了一个又知又会者,真叫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这个鸣,不是她技巧有多高明,而是生活本身太丰富,太生动,太感人,太惊心动魄。

实际上,中国农村妇女苦得惊天动地,苦得难以想象,苦得不像人!

这些苦，是董冰自己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刻骨铭心，绝对是一辈子都忘不了的，包括当时的一句什么话，全是仿佛用刀刻在骨头上的，把它们搬到纸上就是了，用不着创作，用不着回忆，用不着想象，全用不着。

让它们流出来，就成了。

董冰个子很矮，用“瘦小枯干”形容一点不为过。这么个小妇人，怎么挺过来的，百思不得其解。

永远是天不亮就起来，没有表，全摸黑。磨面，背着孩子。生火做一大家子的饭。下地种田。做衣服，先由织布做起。做鞋，人口又奇多，自己生了六个孩子，上有爷爷、奶奶、公公、婆婆，旁边有伯伯、叔叔、姑姑、大姨、小姨、哥哥弟弟姐姐妹妹，不得了，全照应得好好的。农村人说病就病，动辄就死一批，大多死于肺结核，不断地出殡埋人，无尽的悲伤。

完全是地狱般的日子。妇女是底层，是社会和家庭最下面的底线，是地狱里挤在最下面的人群，比男人们承受的重量要大，简直没办法。

咦，全用故事串起来，真人真事，一年一个样，一点不说教，有骨有肉，岂不成了好作品！

董冰的书天然的是个中国农村妇女的写真大集，天然的是个影视剧的好素材。这书里的女人天然的是代表亿万中国农村妇女的大典型。

应该说，世世代代，多少亿、多少辈中国妇女全是董冰式的，只是没有详细描述过。说来真是可惜。

李准教会了董冰识字，没有教过她写文章；但董冰是李准的太太，长期受了家庭的文艺熏陶，这是没有疑问的，这个特定的环境绝对是独特的和罕见的，真是亿万中的唯一。

我们应该为这本偷偷写出来的书感到庆幸，真难得呀！

几千年才出了一个，也许。

二〇〇五年三月于北京

老
农
夫
人
生
史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13
第三章	26
第四章	37
第五章	46
第六章	58
第七章	65
第八章	78
第九章	97
第十章	111
第十一章	124
第十二章	136
第十三章	144
第十四章	158
第十五章	168
第十六章	178
第十七章	190
第十八章	202
第十九章	216
第二十章	230
后记	242

第一章

我的家乡是河南省洛阳市孟津县南麻屯镇董家村。我们那个村子很大，东西有二里多长，有百十户人家，大部分都是董姓，所以叫董家村。村南边有十几家有钱的富裕农民，所谓“富裕”也不过有几亩地。我们村没有超过一百亩土地的人家，但他们都住瓦房。那一片还打了寨墙，是用泥土垒成两人多高的土寨子，东西两边各留了门。西边是个小角门，只能走人。东边是个大寨门，能进大车。有钱人家大车小车都有。所谓大车就是大高脚木轮车，槐木做的，大轱辘，套三四匹骡子和马。这车是有派头人家用的。一般家里都是小低轮铁脚车。低脚车有两种：一种是双牛抬杠车，就是两头牛齐肩拉。这也是比较好的家庭用的。次一点的就是一头牛驾的辕车。那就是喂不起两头牛的家庭，得跟人家“搁犋”。我们家就是一辆这样的独辕车。我们家只喂了一头大灰驴，用驴子驾辕。我们这头驴喂了三十多年。家里大部分亲戚家的路它都熟悉。我母亲要去我外婆家，有七八里地，只要我母亲骑上，父亲在后边跟着，一路不用牵，该拐弯该上坡，它都知道，一直走到我外婆家门口站



1948年董冰的父亲董古兴



住等着我母亲下来。一次，我记得去外婆家，妈骑着驴抱着妹妹，我跟着父亲在后边走，我说：“走不动了。”父亲说：“你走不动了？走不动你拉住那驴尾巴，它带着你就轻些。”真的，拉住驴尾巴走轻松多了。

我们家这头驴经常和邻居董青云家“搁犋”。他们家是一头大白骡子。我们两家不管套车还是套犁耙，都是用这两头牲口来干活。

我们家有二十亩地，父亲就是靠着这些地生活。家里要买点煤、盐，需要花点零钱，都得背点粮食到集上去卖了换点钱。那时候邙山岭上的地，打粮食也不多，所以舍不得卖。

我出生在一九二八年，那一年是龙年。我们姐妹七个，还有三个是哥哥，大哥容贵，二哥容禄，三哥叫容为。有四个姐姐是同父异母，可是我长了好大都不知道。四个大姐姐是一个妈。我总觉得那四个大姐最亲，待我可好了。我同母的五姐比我大两岁，我们两个倒是整天光吵嘴。我感到五姐没有那四个大姐亲切慈爱。因那四个姐都比我大得多，所以我不记事时，她们都出嫁走了。什么时候哪个姐回娘家来了，我总是舍不得让她们走。后来才听我母亲说那个大妈病死后母亲来时，我大姐才十二岁，四姐才四岁，是我妈把她们四个孤儿养大。

因我家里穷，从我记事，我都没有自由地跑着玩。那一年，我大约是四岁，在收麦子的时候，有一天，大哥和二哥都跟父母去地里割麦子了，只有我和三哥还有五姐，光我们三个小孩子在我家打麦场里。我只记得天黑了，到处黑糊糊的。我们心里有些害怕，只好跑到别人家麦场里，因为人家场里有大人好做伴。那个场是个老太太家的，她人很好，看见我们来了，她说：“来吧，来吧，看这几个孩子，天黑透了大人还不回来。你们就在这里等着吧。一会儿你妈就会回来的，不用怕，有我跟你们做伴。”三哥还抱着个小妹妹，她又哭又闹，小妹妹哭累了就睡着了，三哥坐在地上抱着。天黑好长时间了，天上有几个星星，又没灯火。我

们又冷又饿，等啊等啊，忽然听见远远的有牲口蹄子声、牛铃声、车轱辘声，父亲吆喝牲口的声音也传过来了。“哎！咱爹回来了！”老远我们就喊，“爹！我妈回来没？”

“没有，地里还有一车麦子。”

哎呀！这么黑了地里还有一车麦子，那么大老远的西地，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我父亲把车赶到场里，一个人把一车麦子卸下来，又赶着车走了。我们等了很长时间，终于，妈和两个哥哥坐在高高的麦车上边回来了。卸了车，妈才回家做饭，也不知什么时候才吃了饭睡觉。

第二天，天灰灰亮，妈就把我喊起来去看麦场。父亲早已下地了，天一亮，猪和鸡子都要出来寻食吃。到场上，又冷、又瞌睡，真想盖住被子，热乎乎地睡上一觉，该多舒服啊！可是不敢睡，鸡子和猪都出来了，它们一看见场上有麦子，就来抢着吃，打都打不走。猪聪明着哩，它根本没把我放在眼里。我去吆喝它，它眼看着我，嘴抢着吃，知道我打它一下也不疼。直到我跑到它身边，拿棍敲在它身上才跑掉。跑得很快，我追不上它，停一会儿它又拐回来吃。

鸡子更气人，它到场上吃麦子，那嘴叨得快着哩，我吆喝它根本不理。我很生气，想去狠打它一下，解解气，可是等我跑到了，它出溜一下就跑了。我想偷偷去猛打它一下，它见我走近了就连飞带跑，总是打不着。因此，我得不停地追赶它们。啥都怕快怕猛，我拿根棍儿，跑快猛追猛打，它们一害怕，就跑远了。这一下我赶快跑回来钻到被窝里，哪怕是一小会儿，也觉得是享受，但是不敢闭眼睛，怕睡着了；暖热了身子再起来赶它们。

—

父亲一到夏天农忙时，夜里都要睡在场里看场，驴子也在场里喂。五姐在家里能帮妈抱抱孩子扫扫地，干点小活。哥哥能



跟父亲去地里干点轻活。就这样，白天看麦场的事都是我的了。

我们家住的是窑洞。窑院不大，一面只能挖两个窑屋。这种窑洞叫“天井”窑洞，就是平地挖个四方坑，大约挖三丈深。四面土壁上再挖窑洞，再挖个大长坡，坡还拐个弯，进个过洞。这个过洞不深，能竖着放两张床。进去过洞到院里。听父亲说，牲口全凭吃夜草，所以，他夜里喂牲口，很下劲。天一热父亲就在院里放一张小床，夜里就睡在院里喂牲口。

磨屋里还有个牲口槽，那是冬天用的，因为冬天牲口在院里也怕冷，就在磨屋里喂。院子里边共有五个窑洞。一个西屋是盛饲草的，一个北屋是住人的，这个屋很大，还有个里外间，用砖垒了个隔墙，里外放了三四张床。还有个东屋是放杂物的，大门底下靠左边还打了个客屋，放一张桌子，作会客用。窑洞下本来就没有亮光，那个屋只有一头朝着院子，门上一个窗户不到一米见方，木窗格用白纸糊着，屋里地方不小，就是太黑。从外边乍一进去什么也看不见，全靠瞎摸。有客人来了，进了大门就进客房。要是没人知道客来了，他们就喊我哥一声，打个招呼。那个屋平常我们“家里人”是不去的，所谓“家里人”就是从前农村的风俗习惯，把女人叫家里人。男人们都是外边人。家里人也叫“屋里人”，就是个小女孩也是个屁股后的人，不能到人前边立站。这个客屋长年门朝外扣着，只有过年那几天这里才热闹。父亲把这个屋里砌了个小煤炉，大年初一清早，父亲就把煤炉生着了，屋里热气腾腾，我们也可以来坐在煤火台上烤烤火。

这个屋的里头放一张三斗桌，上边是祖先、爷爷和奶奶的牌位。过年这几天桌上摆着香案，地下铺一条席，再铺一条毡。初一这一天村里人都来拜年，先给爷爷奶奶牌位叩头，晚辈的再给我父母叩头。还要赚点东西吃。到谁家给婶子大娘拜年叩头，都得给点吃的。糖、枣、花生、核桃，一人抓一把。到全村跑着叩头拜年赚东西吃的都是男孩子，女孩子不能去。

这客屋的另一头，靠院子窗户底下，也有一张桌子，供的是

财神爷，这儿也上香，摆供叩头，这儿是我们家里人叩头最多的地方。

这个财神爷，各家都敬。不管穷人家富人家，都想发财。过年，各家各户都要买一张红纸，找个人写几副对联或吉利话贴上。家里到处贴，譬如，箱子上贴的是“衣服满箱”，米面瓦缸上贴的是“米面常有”。各家都敬老天爷、老灶爷、土地、门神，这几样神是不能少的。门神爷是看守大门的，土地爷是守护家宅的，老天爷是保佑众生幸福的，给地里下雨、少闹灾祸的。譬如说，两个人吵架，一家穷点，这个人就说：“你穷，谁叫你穷的，日头没从你家门口过。”家里敬的神主要是老灶爷，还有灶王奶奶。他们是管家务的。快要过年，阴历腊月二十三那一天，灶王爷和灶王奶奶要上天走娘家。各家都要给老灶爷送点礼物。烙点白面发面火烧，买点灶糖，给老灶爷供一供，再拿些喂牲口的草料在院子里撒一撒。记得有个曲子是：“东一把，西一撒，打发灶爷骑上马。好话多说点，少说点坏话。只说天不下雨没收成，别说抛撒米面造孽啦。”意思是老灶爷整天在厨房里看得最清，拜托他到老天爷那里多为人们讲点情。

我们这窑院，出了大门上了窑坡，便到场上。场上两边两棵皂角树，树下边各有一块大青石头，右边是个高圆形的，左边是个扁方形的。上来坡，累了，先坐在石头上歇歇。

右边树下还有个牲口槽，夏天父亲要在场里看场，夜里牲口也到场里喂。绕过牲口槽往西走过我家那崖头的西边是打麦场。场子的南边是一座古庙。庙的正面殿里坐着三个泥塑的观世音神像。两边一圈小神像供满一屋，那时群众都叫大奶奶、二奶奶、三奶奶。两边大的神、小的鬼什么都有，我们这些小孩子听了是很害怕的。庙门外两边两棵大柏树，庙门常年锁着，过年那几天才打开，全村人都去烧香叩头。小孩子们一个人不敢进庙，走到那门口，头发就竖起来了。门外的柏树，天一黑看着黑压压的瘆人。庙下边又是个很深的路沟，沟下还有一棵老皂角



树，不知长了多少年，像个大伞盖，都说那上边有什么树神。过年时也有人就地捧几堆土上几炷香，还有人挂块小红布在树上，上边写着“灵位”两个字。小孩子们特别害怕那一棵老皂角树。

三

我外婆家是柏树沟村，离我们董家村有八里地。住的也是窑洞，是出水窑洞不是挖方坑。院子也不大，是在一面高崖头上边挖了三个窑屋，垒了三面墙。大门朝北，大门外是一条山路，留个水道，院子的雨水可以流出去，顺着大路流走了。

我母亲兄妹三个，一个姐姐，一个哥哥，家里很穷，把她姐姐送出去当童养媳。我外公外婆冬天带上我母亲和舅舅逃荒到南山洛宁一带谋生，到麦收时才回来。

我外婆一辈子不会织布，整年给人家纺棉花，让人家给她织布。织一匹土布是两丈四尺长，两天就织完了。她得给人家纺一斤线，至少也得四五天才能纺完，所以我母亲十二岁就学织布，够不着机板，就站在机子里织。后来，母亲和外婆就纺纱卖布过生活。

母亲到我们家时，四个姐姐还很小，后来她又生了我三个哥哥。我妈干活劲头可大了，农村有一种说法叫“活眼钻”。后来把四个姐姐都打发出嫁走。我母亲一个人纺花卖布供我三个哥哥上学。白天帮父亲种地，还要做饭，做穿的，只有晚上搭夜纺花。天不冷时，晚上都是在院子里趁月亮光纺花，天变冷了院子里坐不住人，只好到屋里纺。窑屋太黑又没有油点灯，母亲就在夏天时割些黄蒿拧成绳子，挂在院里墙上晒干；冬天在屋里纺花时，只有点一根这黄蒿火绳，夹在纺车的头上。车子转得快了扇点风，火绳就有点亮光，车子一停下就不亮了，上线时就看不清，只有用手摸摸锭子上线。哪里上多少，该往哪里上，就全凭估摸了。就这样母亲多少年如一日地纺棉花。不光是拿棉花纺线织